

雅加达“振强”和廖建校长(中)

——张茂荣(香港)

晚9时上班，负责收学费、刻写“蜡版”、油印讲义、打上下课钟等杂务。

振强学校办夜校的消息一传出，报名的学员就蜂拥而至，他们都是日占时期的失学青年，已在社会上从商或就业多年。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，南下东南亚，每占领一个国家，就摧毁当地的国民教育。在印尼，只准华人开办小学。

开始时，振强夜校只开办如簿记、会计等商业班，几个月后应社会上想提高文化知识青年的强烈要求，办起初中班。在师资缺乏的情况下，廖建校长要求刚读完高中二年级的笔者，担任初中班的化学和代数教师。

在“巴中”念初中时，因每天下午要到街头卖报，学习成绩不好。初中阶段都是每年勉强升级，每学期成绩单上的总平均分数只有60分到

65分之间，记忆中好像没有出现过70分以上的事。还好初中三结束的那年长暑假一开始，严格的父亲鼓励我，让我读孟子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……”，提高我的自信心。还引岳飞在《满江红》词中的名句“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空悲切！”警示我。

于是下决心利用长暑假，关在家里把初中的数理化习题通统从头做一遍。那些习题大多是初中三年中应该做而没有做的。这样，升上高中后，才较轻松地把功课跟上。然而，当夜校主任要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事务员，兼任化学和代数教师时，我几乎是哭丧着脸接受的。廖校长知道我缺乏信心，耐心而慈和地和我谈心，详谈他从香港初到印尼时，“自强学校”聘

请他担任该校教导主任的经历，告诉我只要努力认真备课，肯定可以把课讲好的，一定会受到有较多生活经验的学员欢迎。

当时的情况是学员已经招进来，教师迟迟没落实。学员多是30岁左右的成人，我只有16岁，只配做他们的小弟弟。正如廖建校长说的，他们的求知欲望十分强烈，学习态度谦虚谨慎，用功且不耻下问。既把我当教师，又把我当小弟；既尊重又爱护。教学相长，努力备课的过程，使我对知识的理解比只做学生时广泛和深入，坐收“温故而知新”之利。其实，向他们学到的比我给他们的还要多得多，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为人处世之道，勤学苦读的学习作风，以及相互关怀，克服困难的品格。从此，白天做学生和复习自己的功课以外，就抓紧时间备夜校的课、批改作业

等。天天忙得不亦乐乎！

没想到从此和“振强”结了缘，高中毕业后，因印尼华校师资缺乏，就留在振强做一个全职教师，既教日校，也教夜校。在廖建校长、黄清林教导主任等同事不断的启发帮助下，渐渐适应粉笔生涯。振强师生关系纯朴，同事关系真诚，校长和教导主任亲密合作，鼓励开展各种文体体育活动：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游泳、田径、摄影。成立利用课余时间活动的各种兴趣小组。一时，不分白天和黑夜，不分平日和星期日、节假日，学校里总是人气十足，氛围温馨而活泼，日夜校师生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

最难忘曾利用暑假组织师生到万隆旅行，那是万隆举行“亚非会议”后不久，我们到那里寻访周总理的足迹，亚非会议

的留痕。而万隆这座山城的美丽和覆舟火山口浪漫、凄美故事，它的山城天气，以及那里纯朴的老百姓，和温柔的“巽达”话，让我们流连忘返。

“振强”于1954年开始开办中学部，80%以上的初中一学生都是由本校小学毕业后升入的。那一年由“振强学校”改名为“振强中小学”：校长廖建，中学部教导主任黄清林、小学部高年级教导主任杨剑锋、小学部中低年级教导主任钟秋暘、中学部生活指导主任张茂荣（至1957年回国）。“振强夜校”不但办得红红火火，人满为患，而且开创了华校开办夜校的先河。以下是“振强夜校”当时开办的课程：

会计科：中、印文初级、高级簿记班，会计班

语文科：中文、印尼文、英文、俄文班；



振强夜校初中班部份师生和廖建校长（左3）林载诚主任（左4）合影